

·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

# 数字阅读与导读中的“互文性”分析

袁曦临

(东南大学情报科技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6)

(东南大学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96)

**摘要:**网络环境下,数字化阅读日益普及。面对网络环境下阅读载体、阅读方式发现的巨变,图书馆必须要调整传统导读的内容与形式,寻找数字阅读理论和导读方式的创新与发展。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其所强调的文本间的网络相关性,十分契合目前的网络阅读环境。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数字阅读和导读研究,既有可能验证和促进“互文性”理论的研究,又可能为图书馆的导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互文性 数字阅读 图书馆导读 超文本

中图分类号: G2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3-0030-05

## Digital Reading and Library Review in the Light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Abstracts** Digital reading is growing in popularity in network environment. Facing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reading medium, reading patterns and methods, the libraries have to adjust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guide reading, and look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review.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was put forward by Julia Kristeva firstly, and its use in digital reading and guiding may be good for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itself, and may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library review practice.

**K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digital reading; library review; hypertext

网络环境下,数字化阅读日益普及。数字阅读不仅在互联网上,而且更多地出现在手机、移动阅读设备上。《中国第八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国民2010接触数字化阅读的比率为32.8%,比2009年的24.6%增加了8.2个百分点。其中有32.4%的网民倾向“网络在线阅读”,20.2%的网民倾向“在手机上阅读”,2.8%的网民习惯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媒体,开始采用数字阅读的方式,这种新方式不仅是传统纸质阅读的有效补充,甚至在80后、90后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从阅读内容的来源上讲,数字阅读的来源主要有两类:其一,网络作者原创的网络作品,如网络小说、博客等;其二,传统书籍的网络版,如超星、Apabi等所谓数字图书馆中的作品。目前国民阅读的趋势呈现出数字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数字阅读的兴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给人们的阅读实践带来了深刻影响。

随着数字阅读、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也慢慢显现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数字阅读中普遍存在的浅阅

读、片断阅读和娱乐阅读等现象。这说明网络阅读虽然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但也需要有针对性的阅读指导和提升。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图书馆如何面对数字阅读这一趋势,如何做好数字环境下的导读工作。面对网络环境下阅读载体、阅读方式和阅读行为发现的巨变,图书馆必须要调整传统导读的内容与形式,去寻找阅读理论和导读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本文认为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经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拓展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十分契合目前的数字阅读环境。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数字阅读和导读研究中将有可为图书馆的导读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 1 “互文性”概念辨析

“互文本”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种文本观念。这一概念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首先提出。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

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sup>[1]</sup>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通过引用、改写或戏仿别人的文本,形成如同马赛克镶嵌一般的拼图。文本与文本之间满布着相互参照和关联关系。“互文性”理论关注的主要是文本间的相互关系模式,强调一个文本总是在过去的已有文本的背景中建立起来,同时自身也被后来的文本回应,重新强调,重新加工和不断改造着,一个有价值的文本似乎永远都不会有终点,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意义网络。因此,对于任一文本的阅读都是历时的,可以在多个相关文本之间穿插和跳跃。这一点对于阅读和阐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互文性”理论深深影响了读者理解和认识作品的方式,开始从单一文本拓展到与之相关的文本,去关注和审视作者的写作行为和文本的内在结构。比如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对于前人作品的明引、暗指、拼帖、改编、模拟等互文写作手法。“影响也逐渐延伸到阅读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产生的重要影响尤为明显。

罗兰·巴特对于“互文性”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将研究的边界延伸到了读者这一边,认为后人对前人的解读,反过来也构成且不断地构成前人文本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立体书写”(sténographie)。换言之,普通的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基于自身阅历和阅读经验,通过自己的主观联想,使得原本由作者创作的一维作品,变成了由作者和他所借鉴、模仿和参考的他作者共同创作的二维作品,进而变成了由原作者、他作者以及读者共同构筑的三维作品<sup>[2]</sup>。

就“互文性”的概念本质而言,克里斯多娃和巴特两人的理解不尽相同。虽然都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但前者更强调文本中的词句、情节、人物形象等意义在文本之间的传递与延续;而巴特则更侧重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是读者的阅读赋予了作者的作品以新生。

“互文”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在古典文献学中“互文”的意思是“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因此在中国的古诗文中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如《木兰辞》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上下两句在用词上不同,但互相补充,彼此辉映,结合起来表达了一个完

整的意思,既丰富了诗句的含义,也避免了语句上的重复。这类修辞手法在古代诗文中颇为常见,如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杜甫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等等<sup>[3]</sup>。

比较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互文”概念,可以看出两者在涵义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中国古代的互文概念侧重于同一文本,甚至至于就是同一语句之内的词语词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西方的互文概念更多关注的是不同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文本与读者之间,乃至社会历史大语境之间可证实的语言关联以及不可证实的意蕴关联。

## 2 数字环境下的阅读形态

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就认知理解的过程而言,存在着相当的差别。最大的不同在于数字阅读的对象是数字化的文本,而数字化文本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随时超链接到相关的文本或主题上。比如在阅读某本小说的过程中,可以随时跳转到相关的读者评论、作者创作经验谈、作者的生平传记,甚至直接链接到改编的电影、电视等其他类型的文本上。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进行超文本(hypertext)阅读。从本质上说,超文本的阅读方式是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最大的差异<sup>[4]</sup>。

数字阅读的这种超文本阅读方式,对于读者的阅读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纸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一般是被动的,是在作者的写作构思和意图引导下,去领略和接受作者思想和表达,其整个阅读过程基本是线性的,由作者掌控和主导着的。而数字阅读则不然,阅读可以不再是循序的,读者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体会在文本内外自由出入,穿梭在文本的意义网络之间,调整、改变自己的阅读进程,关注的中心以及阅读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读者可以不再受制于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成为参与创作的另一方,这在某种意义上验证了巴特所说的“立体书写”,体现出了读者的主导性。

数字阅读的这本质特点恰恰成为了文本间“互文性”的真实写照。事实上数字阅读的发展,可以说直观演示了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这个抽象命题和它所隐含的空间范式。由于网络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过去仅仅停留在概念和理

论形态上的文本的“互文性”，由于超文本技术的发展而得到了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呈现。

事实上，一个人在阅读或思考问题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线性的，总是从一个概念或主题联想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或主题，人类的思维具有联想特征，也可以说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链接的网状结构。而按超文本的非线性、网状方式组织起来的数字文本，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数字阅读，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更符合人类的思维特点。

### 3 数字阅读中的“互文性”分析

法国学者洛朗·坚尼曾这么说过，“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性地阅读文本。”<sup>[5]</sup> 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通过一个接点链接延展，不断扩展，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文本网络，而每一个文本都是这个巨大的文本网络中的一点，或者一个链条。

由此可以发现在数字阅读中，一个文本的“互文性”可以体现在这样三个层面：

(1) 同一文本内部的字词、语句间的关系。例如刘禹锡的《陋室铭》，诗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上下句表达的同一涵义，但句中的“鸿儒”与“白丁”又有反差，从而产生了既同义又间离的关系；这一层面所体现出的“互文性”较为接近中国古代诗文中的“互文”用法，讲究的是词句之间的修辞；

(2) 当前文本与其前文本 (pretext) 以及后文本 (post text) 之间的联系。例如李商隐著名的《锦瑟》，其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四句分别对应了历史上的著名典故：《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华阳国志》中“杜鹃啼血”，《博物志》中“鲛人泣珠”和《新唐书·狄仁杰传》中的“沧海遗珠”，以及《搜神记》“紫玉生烟”的故事。这五个典故即构成《锦瑟》一诗的前文本，而后世的元好问所作《论诗三十首》之十二：“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无疑脱胎于李商隐，是《锦瑟》一诗的后文本。

在传统的纸本阅读中，只有当你了解并熟悉这些典故时，你才能很好理解这首诗的涵义；如果不知道，那么就很难真正了解诗作了。但是在数字阅读中，这个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了，读者可以借助搜索

引擎，获得对于这些典故出处以及涵义的查询，从而在阅读原诗的同时，通过知识单元（典故）的检索和链接，跳跃阅读；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动态生成文本链接锚点技术为古籍文本自动添加语词注释的数字文本，自动在读者阅读数字古籍文本的过程中提供语词注释。

(3) 文本与其所在历史语境、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任何一个作品的诞生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创作者所在历史和社会语境，因此这种历史和社会语境同样是文本性的，可以被看作是更大范畴和意义上的文本。本文用以分析的文本是电影《桃姐》。

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或者说历史语境文本是：20 世纪上半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佣群体。清末民初的珠江三角如顺德、佛山等地缫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经济独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梳女群体。然而到了上个世纪 30 年代，传统缫丝业衰落崩溃，农妇不得不来到城市谋生，最普遍从事的职业就是做女佣。其中从佛山涌入香港的女佣尤多，于是女佣这一行业成为香港最早的职业妇女。女佣的主要职责是为家主料理衣食，帮衬家事，从事各种家庭服务，并无严格的划分<sup>[6]</sup>。在影片中，桃姐的身份是台州孤儿，侍候 Roger 一家 60 年的老佣人。联系她的年纪和经历确实与那些一生未嫁，终身为佣的自梳女命运颇为相似。

《桃姐》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语境或曰社会文本是今天老龄化的社会大背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渐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老有所养？怎么对待空巢老人？老年生活如何保持尊严？所有这些社会问题构成了《桃姐》这部作品重要的相关社会文本。与此社会文本相关的他文本还可以找到不少，如马俪文导演的《我们俩》、美国影片《为黛西小姐开车》等。

此外，电影《桃姐》的两位主演叶德嫻和刘德华在现实中的关系也构成理解这部作品的一个他文本。叶德嫻与刘德华在现实世界中常在电影中合作饰演母子，彼此关照，配合默契，代表作是《法内情》。他们在现实中的关系与影片中桃姐与 Roger 的关系形成了有趣的“互文”，这一点无论是演员本身还是观众都意识到了，也可以说这是这部影片带给观众最好的礼物之一。

“互文性”意味着对于某一文本的阅读，可以在

多个相关文本之间穿插和跳跃。这一点在传统阅读中较难实现,因为你不太可能停下手上正在阅读的文本,去借阅或找寻另一文本来帮助你解决你在阅读中产生的新的兴趣冲动、疑惑或思考。而对于数字阅读来说,实现这一点就变得便捷多了,超文本把“互文性”的属性与特征具象化了,它真实体现了文本与前文本(pretext)、后文本(post text)之间的关系,甚至也打破了旧有的文本结构,模糊了不同介质和载体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比如小说与改编的电影、戏剧和电视剧。当读者面对电脑屏幕或 iPad,所有这些文本形式都可以在读者的主观意愿下通过超文本实现交叉与融合。这正是数字阅读“互文性”的诡异与真实。

#### 4 “互文性”在数字导读中的指导性

数字阅读在年轻一代中已经越来越普及。2011年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商亚马逊宣布其电子书销量已超过纸质书。国内的数字出版业也正如火如荼的发展壮大。目前盛大文学是占有市场份额最大的文学网站,其下有: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言情小说吧、晋江文学城、榕树下、小说阅读网、潇湘书院七大原创文学网站以及天方听书网和悦读网。云中书城是盛大文学的运营主体平台,凭借强大的内容与平台优势,引领数字阅读潮流。

如何认识与理解数字环境中文本变迁对阅读的影响,如何建立和发展网络环境下的阅读理论,以及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和数字文本来拓展图书馆导读的理论与方法,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和解读经典,发展出有效的图书馆导读教育,所有这些问题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举例来说,在网络上阅读和在纸质的书本上阅读《红楼梦》,到底有什么不同?仅仅只是载体不同而已吗?对于读纸本《红楼梦》的读者的导读与数字阅读《红楼梦》的导读有区别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图书馆该如何回答呢?身处一个多元化阅读的时代,图书馆的导读工作应该如何应对?

通过上文对数字阅读中“互文性”的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导读应从图书馆目前仅仅关注作者与作品,提供导读书目,撰写书评等传统的导读和推荐方式,转向更为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导读研究。通过阅读导航,建立数字阅读社区,倡导互文

拓展阅读。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帮助和指导数字阅读的读者加强、加深对某一文本的解读和理解:

首先,帮助读者挖掘文本内部与外部间语言、人物、情节、主题以及结构上的互文性,帮助读者寻求和揭示文本间可证实的影响,寻找文本与文本间的多重联系。

例如《红楼梦》与《金瓶梅》,这两者在故事结构、小说主题内涵以及语言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红楼梦》对《金瓶梅》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模仿和转换;而现代作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无疑又与《红楼梦》有着密切的关系,存在着对于《红楼梦》的模仿和学习,甚至小说的主题都有脱胎于《红楼梦》的明显痕迹。这三部名著横向之间的相互指涉无疑构成了“横向互文”。

而小说原著与以其为原型的电影、电视、戏曲等等的改编,如小说《西游记》与动画片《大闹天宫》、电影《大话西游》;话剧《雷雨》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纵向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属于纵向互文。

通过对原文本的迁移和重构的路径分析,帮助读者加深对文本内涵的理解,发现文本与历史、社会文本之间的关联,进而把对于文本的解读放到恰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去。由此获得的阅读体验无疑比单一文本的阅读要深入和丰富许多。

同时,通过超文本技术,实现知识单元之间的链接。采用超链接等技术,在原文与相关文本之间进行链接,提供阅读导航,拓展阅读内容。例如对于《论语》这样的经典,可以利用动态生成文本链接锚点技术为文本添加语词注释,对书中的典故、特定的官职称谓、人名和历史地名以及疑难字词进行注释,从而为读者建立起基于超文本的立体阅读社区。

当然在数字导读过程中也需要考虑避免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文本场景和节点的链接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否则会造成屏幕频繁的上下移动和页面跳转,反而会使读者的注意焦点频繁跳转,干扰到读者的阅读,造成读者阅读完整感的缺损,影响网络阅读的质量与效果。

#### 5 结语

阅读从根本上讲,就是读者对于作品的阐释,数



字阅读无疑给传统的图书馆阅读和导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信息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等热点研究相比,国内的阅读研究仍停留在社会呼吁和书目推荐导读的阶段。对于文本变迁对阅读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和发展网络环境下的数字阅读理论,帮助读者解读经典,开展有效的数字导读等问题都没有深入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

导读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过程,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如何仅仅停留在新书报道和推荐书目方面是远远不够的。本研究通过对数字阅读中的“互文性”的分析,揭示出数字文本中存在的横向或纵向的互文关系,相关的各种文本相互指涉,相互参照,也相互依赖,作品的内容也正是通过这种再现与交互得到延伸与丰富。提出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数字阅读和导读研究,既有可能验证并促进互文性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同时为图书馆的导读实践提供了理

论指导。二者交叉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 [1]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18.
- [2]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19-30.
- [3]董希文.互文观念视阈下的文学经典文本解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118-122.
- [4]费多益.超文本:文本的解构与重构[J].哲学动态,2006,(3):43-47.
- [5]洛朗·坚尼.形式的战略[A].蒂费纳·萨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82.
- [6]夏坤.晚清广州女佣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7-20.

作者简介:袁曦临(1968- )女,东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上接第29页) 权利之一。但同时,也允许非会员订购。不过定价不同,很强调区别对待,美国订户的定价总是最低的,加拿大、墨西哥等美洲和西班牙邮政联盟国家稍高些,其他国家则最高。

有意思的是,许多刊物注明是非卖品,主要发送给成员,不提供订购。但也有不论是否成员都必须订购的,如《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Newsletter on Intellectual Freedom》、《Children's Programming Monthly》等(当然定价也有区别),看来是需要自负盈亏吧。

著录项目里没有发行份数,从许多刊物的主页也较难找到有关数据,但随机地看到了东南图书馆协会的《The Southeastern Librarian》(季刊)每期发行1750份,影响较大的《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季刊)2010年1月的发行数字是4161份,其中会员3378份,影响更大的《American Libraries》仅发送给约定的会员的即至少有65000份,看来都还

是颇有市场的。

参考文献:

- [1]ALA Periodicals[EB/OL].[2011-10-16].<http://www.ala.org/ala/aboutala/offices/publishing/productsandpublications/periodicals/periodicalscfm>
- [2]ALA State and Regional Chapters [EB/OL].[2011-10-24].<http://www.ala.org/ala/mgrps/affiliates/chapters/state/stateregional.cfm>.
- [3]ALA Periodicals——List of the Periodicals published by the ALA (division and division sections, offices, and round tables,in alphabetical order)[EB/OL].[2011-11-24].<http://www.ala.org/ala/aboutala/offices/library/alape-riodicals/index.cfm>.

作者简介:孟广均,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员(退休)、吉首大学特聘教授;王月娥,女,吉首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